

翻译家

Zhou Zuoren As Translator

周作人



王友贵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K825.6=72/4

翻译家周作人



R13m44/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家周作人/王友贵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6

ISBN7 - 220 - 05445 - 9

I. 翻... II. 王... III. 周作人 - 生平事迹
IV. K8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975 号

FANYIJIA ZHOZUOREN

翻译家周作人

王友贵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蒋跃梅
魏晓舫
杨 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 booksss. 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af@mail. sc. cninfo. net](mailto:scrmcba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刷
开本
印张
插页
字数
版次
印次
印数
书号
定 价

成都市蜀丰印刷厂

850mm × 1168mm 1/32

9. 25

4

190 千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1 - 1000 册

ISBN7 - 220 - 05445 - 9/K · 747

16. 00 元

■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中国 20 世纪前半不少作家因际逢变革的历史语境使其普遍产生强烈的言说欲望，新学新知的初识和自身思考能力的不足等诸因素迫使他们双管齐下，形成翻译和写作的变奏。这种现象到了 20 世纪后半却基本不复存在，而 20 世纪后半的学者似乎没能复原文学史和翻译史上这段空前特殊的语境。本文试图复原当初的变奏的言说背景，将周作人放在不同的阐释视野来探察。

本文试图从周作人的译作、序跋、评介文字和文艺思想文章梳理、论证他的思想、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演变。它在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两方面均试图有所突破：它既是对一个重要文学翻译家的首次系统研究（却以译文为本），又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探察周氏翻译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本文试图说明，在 20 世纪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在新文学处于“年青”或正在建立时期，翻译在周作人这类文学家思想家那里，不仅是输入，也是输出；不仅是译介，也是塑造。翻译可以并且参与了新文学系统的建造。

本文揭示了作为 20 世纪中国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启蒙主义者周作人与众不同的启蒙方式；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讨论了他的文学态度的演变、对人的觉醒等问题的前后不同理解、附逆的一



个深层原因、非圣无法的叛逆精神等，在此方面作了新的或已有研究基础上之进一步的阐释。

ABSTRACT

A great many of the eminent writer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 were burning with an unquenchable desire to utter their voices, but inadequate command of the new knowledge, their way of thinking which was developing, and other factors worked together to engage them in speaking in both pens,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which functioned as variations in expressing their ideas. Such a literary scene has disappea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The scholars of the Chines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however, seem to have failed to revive such an unprecedented context, which this book takes as its task, trying to examine the same subject from an entire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is book attempts to take a systematic look into Zhou's translation, prefaces or postscripts, and essays on translated works or on literary theory,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r changes in his thoughts, literary views and taste, in the hope of achieving a breakthrough both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areas. It is both a systematic study of a leading translator for the first time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ed works, and a look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Zhou's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It tries to show that in the unusual historical context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lation, done by eminent writers and thinkers like Zhou and possibly a few others, when the new literature was still too young and at its initial period, was not only import, but export; not only introduction, but help mould the new literature; i. e., translation could and di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ateral system.

It reveals Zhou's unique way of the Enlightenment as the most rebellious one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a, discuss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changes in his literary attitude, hi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ose questions such as "man's awakening" at different time, possibly one cause for his serving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in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 his spirit as a rebel, his perseverance in man's position, and his d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myth through translating Greek classics.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没有夭折的“新生”	(21)
第一节 现代文学翻译的“尝试集”	(21)
第二节 《点滴》——点点滴滴的启蒙	(47)
第三节 从《点滴》到《空大鼓》	(63)
第三章 再见,伟大的俄罗斯文学	(76)
第一节 《陀螺》:文学的游戏性	(76)
第二节 土之盘筵:童心童趣	(103)
第三节 30-60年代:告别“被侮辱的和被压迫的” 文学之后	(115)
第四章 大陆的歌人	(121)
第一节 新村的热狂	(121)
第二节 平民文学	(149)
第三节 贵族文学	(176)
第五章 希腊精神	(195)
第一节 希腊精神:求知·求真·求美	(195)
第二节 叛逆精神	(230)
第三节 非圣无法	(253)
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275)
后记	(284)



CONTENTS

CHAPTER 1 A New Approach to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1)
CHAPTER 2 “Renaissance” : Dead or Survived?	(21)
1. An Experimental Book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ry Translation	(21)
2. Selection Of Bits(<i>diandiji</i>): Enlightenment Bit by Bit	(47)
3. From Selection of Bits To Big Drum(<i>kongdagu</i>)	(63)
CHAPTER 3 Farewell, The Great Russian Literature	(76)
1. A Top: Recreativeness in Literature Rediscovered	(76)
2. “Kids’ Dinner”(<i>banjiajia</i>): Childlike Innocence and Playfulness	(103)
3. 1930s – 1960s: After His Farewell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Insulted and Oppressed”	(115)
CHAPTER 4 A Chanter From the Mainland	(121)
1. The New Village Craze	(121)
2. The Populace Literature	(149)

• 2 •



3. The Aristocrats Literature	(176)
CHAPTER 5 Hellenism	(195)
1. Hellenism: Pursuing Knowledge, Truth and Beauty	(195)
2. Rebelliousness	(230)
3. Challenging The Divinity and The Laws	(253)
Select Bibliography	(275)
Postscript	(284)



第一章

导 论

一

中国 20 世纪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的普遍现象，即 20 世纪前半不少作家皆从事翻译，其中优秀者、勤力者且有大量译作存世。在“五四”一代文化人中，找一位只作不译的新文人跟在 20 世纪后半找一位作译并举的文人大概同样困难。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现象，但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与研究投入。20 世纪前半的文学翻译与后半的差异甚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是译者握有翻译的选目权，翻译属于个人劳动，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际逢“乱世”的历史语境使他们普遍有强烈的言说欲望，新学新知的初识、强烈的输血意识以及自身思想能力一时的不足迫使他们双管齐下，左右开弓，却并不十分刻意地区分创作与翻译。他们言说的需要和愿望非常强烈，因此在他们心里，翻译和写作交替地成为言说和宣泄的方式。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陈独秀等一代人是如此，谢冰心、茅盾、徐志摩、李劫人、郭沫若等也是如此，再后面的王鲁彦、



巴金、梁实秋、施蛰存、梁遇春、梁宗岱、丽尼（郭安仁）等人还是如此。这种现象到了 20 世纪后半却不复存在，且 20 世纪后半的学者似乎没能复原文学史和翻译史上这段空前特殊的语境，他们主要地将几代文学家置于 20 世纪后半逐渐形成的研究模式之下来考察，那是一种将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截然分开的模式。

在 20 世纪前半的文人中间，他们原本并不讳言自身从翻译中的受益，因为在他们那里，翻译同写作都是言说的方式；他们在提到自己翻译的时候，并没有像今天那样敏感。然而应该说，连那些当初双管齐下的文人，也可能随着一种潜在的孤立主义意识（它在 1950—1970 年期间成为国家论述的组成部分）的滋长，也可能随着作译比重的变化，作译观念的变化，逐渐无意识地默认或者公开接受了这种分离模式。毕竟接受后者并不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毕竟分离的文学研究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反倒是世界性的。

以色列文化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伊文·左哈（Itmar Even-Zohar）在他的“多系统理论”中曾对翻译作过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讨论，阐述了“翻译——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系统里所占的位置”^①。他认为：“翻译其实是既可以占主要位置，也可以占次要位置，视乎当时该文化里其他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所谓占主要的位置（in a primary position），是指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系统的中心的工作。这种情况会在下列三种情形下出现：一是当这个多系统还没有完全形成，也就是该文学是处于‘年青’或是正在建立的阶段；二是该文学是处于‘边缘’或‘弱势’的阶段；三是该文学正处于‘危机’或转折点，甚至是

^① 参看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绪论第 5 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3—25 页。



处于一个文学真空 (literary vacuum)^① 的时期。假此理论来观照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域外小说集》问世的前后正处于左哈所说的第三种情形,为《新青年》翻译时期乃至 20 年代的翻译,在新文学史上应当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推开来,整个 20 世纪前半文学史的发展情形也是大致如此。对晚清和民初翻译文学所占的重要地位,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述^②。这些论述虽然没有采用跟伊文-左哈类似的术语,但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并且承认翻译文学在积极参与建造新文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的论述亦止于此。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欧洲一些小国家的学者开始了一场翻译研究范式 (paradigm) 根本性的转移^③,伊文-左哈的上述观点就是这场转移的理论成果之一。受他的影响,另一位以色列学者图里 (Gideon Toury) 进而提出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理论^④,还有一位重要的学者赫尔曼斯 (Theo Hermans) 把这一批

① 转引自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绪论,第 23 页。王宏志也在该书参照左哈的理论对中国文学与翻译的关系作了探讨。请参看上文第 7 节。

② 参见阿英:《晚清小说史》第 14 章,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3 月新 1 版,第 210-220 页;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 1-2 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76 页;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年第 1 版。

③ 参看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绪论第 4 节,第 18-23 页。

④ 参看上文,第 26 页。关于图里的以译文为中心的理论,请参见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125-134。另外,译成中文的资料,王宏志对图里提出的观念有一个简述,兹抄录如下:“‘翻译’的概念应该大大放宽,关键在译入语文化读者的眼里是否把某一个文本视为翻译,而不是说要翻成什么样子才能称为翻译,这种跟过去以原著为中心的翻译观念很不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直译、意译、改写、改编、复写、重写等,甚至是完全捏造或虚构出来的译本……也可以被视为翻译,成为考察的对象。”



学者的共同特点作过归纳^①：

他们共通的地方，简单而言，在于认同文学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系统；他们相信理论模式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应该不停地相互影响；他们认为文学翻译研究的路向应该是描述性的、以译入语方面为中心、是功能性的及系统性的；他们很有兴趣去探究影响翻译产生及接受的准则和限制、翻译以及其他文本处理之间的关系、以至翻译在一既定文学里，以及在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位置。

本书的研究路向也是描述性的，以译文为中心，不过本书探究的重点不可能像引文所说的那样广大，倒是比较接近“翻译在一既定文学里，以及在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位置”。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周氏大量的翻译作品的具体分析，试图探索周作人的翻译文学和翻译活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与周氏自己思想和文学观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这虽然是一个个案研究，但它在文学史上和翻译文学史上未始没有意义。因为这在 20 世纪前半是个普遍现象，也因为我相信 20 世纪中国文学也存在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正是 20 世纪前半文学家翻译家那种特有的言说方式引动了本书的研究视角。来自研究对象的不少材料——在周作人则是大量材料——使我深信，他们的创作世界和翻译世界之间存有一种互动关系，二者合起来构成了一

① Hermans, Theo: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pp10-11. 转引自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绪论第 4 节，第 22 页。



个具有研究价值的、互文互证的领域，值得去踏勘一番。这种混合文本有可能接近复原当初的言说背景。为了拓宽探察的范围，使本书多少呈现一点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的意义，我还对另外两个重要作家和翻译家——茅盾与巴金——的文学翻译作了试探性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证实了本书的研究视角的可行性。

在“五四”一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中，周作人文学翻译的影响很早也非常大。不过对周氏译品对一般接受者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不是本书的目的。细读周氏翻译，觉得翻译对于文学家周作人本人的确发生过较大影响，翻译与他的文学理论、文学趣味、文学创作乃至整个的言说方式的演变密切关联。再有，对作为作家的周作人的专门研究成果丰富，有些很有深度，而对作为文学翻译家的他，却成果甚少，缺乏专门的研究^①。而我以为，没有这一面的考察，对他的研究则必然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因为周氏的文学世界并非单单由创作构成，翻译对于他也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入和“学习”，更非“业余爱好”，而是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构成。对于构成周氏文学世界之“半壁江山”的文学翻译^②，研究的兴趣和成果都极为有限。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探究周氏，不仅是对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系统的翻译家研究在我国也非常少），而且也不失为一个进入周作人文学世界和思想的新视角，是将同一个研究对象放在

① 域外已有人对鲁迅的翻译活动开展专门研究，并完成博士论文。参见王宏志：《民元前的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 1 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69 页。

② 请参阅本书第 5 章第 1 节第 198 页注②对周氏翻译总量有一个统计，并跟他的创作总量有个比较。



不同的阐释视野^①。

二

以传统的作家研究的方法所作的周作人研究是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热点，据统计，仅从1990年到1997年9月就发表了各类文章约160篇，研究专著9种^②。这些研究以及整个20世纪的研究大多以周氏撰写的文字为本，围绕周作人的思想、人生道路与人生哲学、政治行为与人品、文学观、散文创作、文化民俗研究等方面用力，成绩十分可观，使周作人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推进。但是，倘若我们借用周作人本人常常采用的从上下左右观察对象之法，便会发现周作人研究中一个巨大的空白，即对作为文学翻译家的周作人的研究十分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未出现。

周作人从20世纪初提笔到“文革”前夕（1966年4月）最后的搁笔，都是翻译之笔。即便是在1931—1942年译作最稀少的时期，他也写了一些介绍性的或与翻译有关的文字。从时间和译作总量上看，说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构成他一生文学生涯的“半壁江山”，似不为过。自然，单以数量论不足以说明问题。重要的是，周氏本人对翻译有完全不同于一般文学家的看法。他的自编文集《永日集》（1929年）便将译文同作文合编，且将译文置显要地位。众所周知，周作人很长一段时期作文以“文抄公”著

① 借用南帆的用语，但涵义不尽相同。见南帆《个案与历史氛围——真、现实主义、所指》，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第107页。

② 参阅黄开发：《九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刊《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7期。



称文坛，但无人能否认那不是周氏想说的话。即便是在周氏最为得意、可以随便说话的 20-30 年代，他也认为翻译在他亦是言说方式的一种。他在《〈永日集〉序》里说：“有五篇是翻译，有人或要不赞成，以为翻译不该与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这句话自然言之成理。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① 与他十年前在《人的文学》中表达的中外之间不必有界限，不必设置墙垣的思想完全一致，而且在这方面他在 20 世纪前半的文学家、翻译家中间实在是实行得最为彻底的一个。

周作人在《永日集》里那番自我辩解的话，在现代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是交换”的论述里得到一个间接的证明^②。如果把周氏翻译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上来看，我感觉他的文学翻译不只是一般意义的介绍，或者输入，而且也是一种塑造，是一种希望对中国新文学发生作用的有心的输出，译家期盼他的译介对中国新文学主动地起到塑造的功用。这从本书第二、第三章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至于第四、第五章的讨论，由于周作人后期翻译出现了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控制元素（我将很快讲到周作人翻译的分期），即文学系统以外的“赞助人”（patronage）^③ 发生根本变化，译家选目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更为重

① 周作人：《〈永日集〉序》，收入《永日集》，引自《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601 页。

② 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转引自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年第 1 版，第 286 页。

③ 参看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绪论，第 31 页。